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經 濟 學 史

(三)

因格拉門著

胡澤譯 許炳漢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 濟 學 史

(三)

因 格 拉 門 著
胡 澤 許 炳 漢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經濟學史

美國 (America)

在這裡我們最好掉換我們的話頭而注意美國經濟學者揆立的學說。在揆立以前合衆國的人士對於這科學貢獻很少。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是世界著名的人物，曾著許多論文，在大部分的論文裏面，他只注重關於勤勉和節儉的許多實行教訓，而且在有些文中揭出一些有趣味的學理。他在斯密五十年前便提出（可是配第在早已說過）人類勞力是價值的真正度量（見於他在一七二一年出版的紙幣之性質及需要之研究〔*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他並且在他的人口增加之觀察（*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一七五一年出版）裏發表與馬爾薩斯接近的意見。哈密爾敦 (Alexander Hamilton) 乃財政部秘書，於一七九一年以其職務的資格向合衆國衆議院

提出一個促進國內工業方案的報告書。在此書裏面他批評關於這問題的學說，以為斯密的自由貿易制度須世界各國同時採用纔可實行，認定工業的生產力比較農業的生產力大，并且反對以美國資本缺乏，工資過高，土地價賤，不能發達工業的說法。他得到的結論，是為建設美國工業起見，須採用一種合理的保護關稅制度，他并且說出這制度應有的特點。德國經濟學者李斯特（List）當他遠離故鄉，寓居美國的時候，應很受哈氏學說的感動，這是有理由相信的。

揆立（Henry Charles Carey 一七九三—一八七九）是一個由愛爾蘭移居美國的公民的兒子，代表反抗斯密學說經馬爾薩斯和李嘉圖之手所有消極性質的一種反動。他既堅持個人主義的經濟學，他的目的要把牠安置在一較高和較確定的基礎上，鞏固起來，使牠不受社會主義的襲擊，這是李嘉圖派的有些教義使這科學陷入此種危險的。他的最博大和最成熟的見解見於他在一八五九年刊行的社會科學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一個新起的少年國家，擁有無窮的未開發的富源，於將來有無限的希望，自然發生一種樂觀的情緒，揆立充滿了此種情緒，所以他要講明在人類意志以外，有一種自然經濟法則之存在，這法則是利益的，社會之日進興

隆，特別是勞動階級的繁榮，是此法則的自然結果，這些結果，只有人類的愚盲或頑固抵制或阻止這法則的進行，纔不實現。他駁斥馬爾薩斯的人口學說，以爲人口在善良管理的社會中是很能自己管理的；人口受食物的壓迫，是文化較低而非較高的時代的特色。他反對土地報酬漸減律可以在一切文化的時期中普遍的真實，是很正當的。他的根本的學理見地即是財富與價值之對立論。

大多數的經濟學者都把『財富』（wealth）與交換價值的總合混爲一談；甚至斯密也不免有此病，雖是最初他表示牠們的區別，卻以後又墮入此種錯誤。李嘉圖自然也說出這區別，可是在他的書之末尾纔談到，而且書內只討論價值。稍後的英國經濟學者都認爲他們的研究只限於交易；所以推究其極，惠特力（Whately）有改易此學名『貿易學』（catalactics）的提議。我們根據『財富』的真正涵義——即是有用產物之總合——就見出財富發源於外部的天然，如物質與物力，以及人類的勞力，如配置利用這些自然物和自然力。『自然』給助力於人而不索報酬；勞力是價值的唯一基礎。我們愈不能配置和利用自然力於生產上，則產物的價值愈高，而增加於我們財富的，與所費勞力比較，則愈少。財富——按照有用產物總合的真正意思——是計算我們已

經戰勝自然之能力的度量，而一件物品的價值乃表明我們要生產這物品所須征服的自然的阻力。財富在社會進程中是日漸增加的；而物品的交換價值乃日漸減少的。人類的智慧和社會結合的能力，對於控制自然，權力日有增加，利用自然力於生產上，範圍也逐日擴大，所以得到一種結果所費的勞力，也次第減少，而物品的價值因此漸漸低落了。一物之價值不由牠的過去生產費決定；而真能決定價值的，乃是在現時智識和技術情形之下牠所需的再生產費。像這樣解釋的價值，依靠生產費，揆立認為是普遍真實的；而李嘉圖則以為這種原則只可適用於無限制再生產的物品，并特別認為不適用於土地。李嘉圖認定土地的生產力是自然的賞賜，這種賞賜為少數人所專有，并隨食物需要的增加，牠的價值在所有者手中也漸次增加。這種價值，不是勞力之結果，所以可以主張地主沒有要求的權利；因為他不能正常的要求『土地原始的和不減的能力』所生產結果之代價。可是揆立的主張則異是，他以為土地在我們實業生活中，實在是一種人力造成的生產工具，土地的價值乃緣於過去在土地上所費的勞力——雖是不以實際所費勞力的總數去度量，一定由在現狀之下把新土地作成到同樣生產力的土地所必需的勞力去度量。他是美國人，對

於研究土地的佔領和開墾，占特別的便利，最初移殖的傳說尙是活樹的和新鮮的，而且在他的眼前，這種情形仍然進行不已。把一塊荒地弄到可以生產適於人用的有機物，這工夫是很困難的，一個多年開闢國家裏的居民，最容易把牠輕看。在揆立的意思，就是戰勝這些困難所費的艱苦忍耐的努力，使這土地最初占有者有享受這種財產的權利。土地的現在價值不過是所費勞力的最小部分，因為牠只代表以我們現代的科學和工具把土地原始狀態改變到現在情形所需的勞費。因此土地產業不過是置業資本之一種形式——勞力的數量或勞力的結果永遠溶合在土地內；土地所有者對於這些勞力，也如其他資本家一樣，也受一部分產物的報酬。他不是受自然力的報酬，社會決不會受他欺騙，讓他單獨享有這些權利。所謂李嘉圖地租說，只是一種抽象的幻想，與一切經驗矛盾的事實上開墾不起首於最好的土地，然後依照肥瘠的等第挨次開墾下去，如那學說所假定的。礮薄的和乾燥的高地最先開墾；直到人口稠密和資本已積聚以後，則富有沼澤潮濕瘴氣的膏腴低地，纔開始墾殖和占有。地租在產物的比例上，也如其他資本的一切利息，逐日低落，可是在絕對數上，則日有增加。勞動者的所得，在比例數和絕對數上，都漸次增加的，所以社會各階級的

利益是這樣調和的。

可是揆立要圖實現這種調和進步起見，他說，從土地取出的東西應當還給土地，一切從土地取出的東西，實在是土地的分析的各部分，若是顧慮土質枯竭，這些東西都當還給土地。因此生產者和消費者須彼此緊接；土地產物切不可輸出外國去換牠的工業品，因為這樣便把肥料落到外地了。這樣出口貿易，地主在目前的交換價值上雖是有利，可是土地的生產力將受損失。所以揆立在開端是一個自由貿易的熱心家，卻得到保護主義的結論：社會的聯合力量應當阻止利私的活動，不妨害公益。他對於這問題改變態度的原因，他認為是觀察自由稅則和保護稅則各影響於美國興盛的結果。他說，這種觀察使他再返到學理上，並引領他見到所說的這種干涉於掃除（用他的話）較老較富足的國家加於較幼稚的國家進步上的障礙是必需的。可是除了他自己對於英國的興盛有一種根深的和遺傳的忌妬與憎惡外，李斯特的著作似乎對於他的態度改變也有些勢力。

他這樣得到的實行結論，雖不與他假定自然經濟法則之存在有衝突，卻與他的樂觀計畫不

密合；而另一經濟學者，巴斯楊 (Frédéric Bastiat)，採取他的根本觀念，從事剷除他認定的外國之繁榮，并宣傳社會自然調和說爲實行自由貿易當然的結果。

法國(續前)

巴斯楊 (Bastiat, 1801—1850) 雖不是一個深沈的思想家，卻是一個經濟問題之漂亮和通俗的著作者。他雖是對於經濟研究夙有嗜好，卻是因他熱烈同情於英國的反穀物法運動，纔最初衝動積極宣傳他的主張。他是一個天性熱烈的人，很熱心的參加自由貿易的論戰，他希望借此影響法國的經濟政策，并於一八四五年刊行一種這類爭鬪史，名哥布登與聯邦 (Cobden et la Ligue)。一八四五至一八四八年他的經濟詭辯論 (Sophismes Economiques) 出世，在一八四九年由坡爾忒 (G. R. Porter) 譯爲英文，在一八七二年斯忒林 (P. J. Stirling) 又重複譯之，在此書裏面，表顯他心思最優秀的性質。雖是懇茲把此書比爲『地方文學』 (lettres provinciales)，似乎太過，確乎也不少生動、中肯、和精采的地方。可是揭穿普通保護主義的荒謬不是一件

難的事體；此書值得并要求我們注意的，只是因牠持論的形式與保護政策在李斯特計畫中所取的形式一樣，以這政策純粹是臨時的和預備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使法國自由貿易運動宣告停止，以後巴斯楊的努力，用於反抗社會主義派了。除了幾種小作品與詭辯論有同等價值外，他於自由貿易辯論又產出他最野心的和最特色的作品，名經濟調和論 (*Harmonies Économiques*) 斯忒林於一八六〇年譯為英文。此書只是第一篇付印；於一八五〇年公之於世，而同年著作者即去世。從此以後，他預備第二篇出版的材料所有筆記和綱要，均搜入他的著作叢集中以公諸世人（此書為白洛德 (*Paillotet*) 編輯，并有封特內 (*Fontenay*) 立傳，共七篇。）我們可這樣得到他下半部書的精神和實質。

此書是澈底經濟樂觀主義的最後表現，這是很有歷史趣味的。此種樂觀主義，返還到牠的最初本源，從神教思想出發；而討論政治經濟學并涉及『相關的最後原因』極爲牠的英文譯者斯忒林所讚美。此書的精髓在表明『一切原理，一切動機，一切行爲的動力，一切興趣，都是通力合作同趨一偉大的最終目的，這目的人類將永遠不能達到的，不過漸次的趨於接近，即是各階級人類無

限的接近一水平線，這水平線是漸次上升的——換言之，即一切人類在一切幸福中完全平等。』

在他的計畫中可稱爲新奇和特異的，主要是他的價值學說。他堅持價值不是表明一物本身內部的東西，牠所指出的不過是兩種『勞役』的比率。他用許多議論和方法去發揮這見解。據他的意思，只有人類交互的勞役纔含有價值和要求補償；在生產中自然給予人類的幫助恆是無報償的，決不能進入價格中。經濟的進步，例如機器之改良與擴充，恆把效用的原素從財產的，因此也是價值的，範圍中，轉移到社會的，或普遍的不用錢買的範圍內來。我們可以見出，此說實質上與揆立在前闡發的學說是一樣；巴斯楊也有許多話申明此說是從揆立取來而沒有表示謝忱。杜洛葉也有同樣的見解，或許一般人沒有十分注意；巴斯楊說杜氏之書對於『科學的恢復』很有力量，並且爲巴氏作傳的封特內也說巴氏承認杜洛葉爲其先師，孔德爲另一先師。

剛纔所講關心實業行爲和實業進步的論調，在實際可適用的限度內，是有趣味和教益的，可是牠過於概括了。懇茲指出巴氏學說的健全很受他研究學說恆直接顧慮當代社會的和政治的非難之習慣，損害不少。所以他預有成見，對於似乎可邀一般合法的和有價值的機關批准的說法，

更加採取，對於似乎使他發生危險結果的說法，則一概拒絕。他的恆久目的，如他自己所說的，是在「打毀反社會派手中的武器」，這種成見，很牽掣他尋求科學真理的專一的心志。他創造或採用這種價值學說的原因，由於他意欲抵制社會主義對土地產業的攻擊；爲論戰的便利起見，最好是能指出除了自己勞力以外，社會并未支付任何代價。所以他的地租說，可以說是預有成竹的，雖是揆立的著作已有這樣的提示，如白洛德編輯巴氏叢集所說的。他同這位美國學者一樣，認爲地租純粹是地主或其前人披荆棘、開溝渠、築藩籬和其他種種永久的改良，把天然土地變爲田莊的工

程中所費的一切勞力和費用的報酬。他這樣便排斥了所謂李嘉圖地租學說，因爲這學說是社會主義者所採用，并用來攻擊土地產業制度，或者至少幫助社會要求土地分配的報酬而讓給權利於勞力。懇茲說：「巴斯楊的結果如是：他既以無限辛苦把「自然」無償的賞賜排出於價值原素之外，并明白的認定價值現象即是人類勞力（很可說是與人類勞力結合），以爲是價值的唯一來源，他用「勞役」(service)這名詞去表明人類勞力，可是他運用這名詞時又承認他學說的精神所排斥於價值以外的這種無償的自然賞賜爲價值的來源。」若是一個人考察巴斯楊怎樣講

明一顆金剛石的價值之問題，便覺得這種批評是很公道的。在最多數的一羣交易中，代價之支付，自然是勞力，這是無人爭辯的。可是竟以一顆偶然拾得的金剛石的價值，是代表拾得者處置和移轉此物所費勞力的報酬，這的確是把他的價值學說認為普遍適用所得的荒謬的推論。論到土地，地租的一大部分，在普通的意思，很可解釋為資本上的利息，然土地原有的能力是很可據為私有的，所以使用這種能力，一方要求代價，一方須支付代價，這也是很顯然的。

巴斯楊在哲學方面極有弱點；他充滿了神教目的論的觀念，并且被這觀念引領，使他對於現有的事實和法則，預先有一種演繹的成見。『自然法』(Jus naturae)，也如一般形上哲學觀念一樣，是在神學中有深固的根蒂，深入巴斯楊的學理中，不亞於在天治派學者。因此，他在他的自由貿易(Trade)中說道：『交易是自然的權利，如財產一樣。一個公民造出或得到一種產物，他就^有自由處理這產物的權利，或直接供自己的享用，或讓與地面上承認給他願意的東西與他交換的任何人。』都果也曾說過這同類的話；并且在都果那時候，這種論調是可原諒的，而且暫時有用的；可是在十九世紀的中葉，這種說法，便應當看透，并且應當放棄了。

巴斯楊對於經濟學有真實的熱忱，以爲此學補益人類甚大，並且對於影響他的思想的各學說，相信尤烈。他的樂觀主義的誇論，即使是贊助資產階級，卻不是出於自私或卑鄙的衝動。可是誇論仍然是誇論，在近代勞力和資本的衝突中，他高唱的『社會調和』論，無異在不太平的地方，大呼『太平，太平。』實業自由，他認爲是萬病良藥的，自然也已經發生不少利益；可是充分的經驗已表明這種主張不能解決社會問題。我們怎麼可以向主張經濟革命的人說在自然經濟中凡事都是調和的，去對付他們——即是說，他們所尋求的，都已經有了。自然在社會中有某限度的自然調和存在，因爲沒有這個，社會便不能繼續下去，不過這調和不完全而且不確定的；這問題是我們怎樣纔可得到最高限度完全的和確定的調和？

庫洛 (Augustin Cournot, 一八〇一—一八七七) 是第一個富有數學和經濟學的知識，而努力運用數學以討論經濟問題的人。他的書名數學原理上財富學說之研究 (Recherches sur les Principes Mathématiques de la Théorie des Richesses) 出版於一八三八年。在這書裏面，他所述說的，不過是甘拉德 (Nicolas François Canard) 以前所做同樣的事業（自然還有

他種學說，甘氏的書於一八〇二年出版，爲學院（Institute）所褒獎，雖是『此書的原理是極端謬誤，而且錯謬的運用。』庫洛雖是有名的數學著作家，可是他的研究一書卻發生很少印象。這原因是一則因他的研究有些地方不甚重要，有些地方不算正確，一則因他進行計算所用的抽象，有時忽略了問題中的真實部分。他的篇頁充滿了符號，這符號表明未知的『功用』（Functions），至功用之具體形式則以事實的觀察去決定，他認爲這種工夫不是他範圍內的事，他或者只取未知功用的已知性質用爲演繹的基礎。澤豐茲（Jevons）的書目中，包含有數學的經濟著述，內有庫洛於一八六三年出版的第二種作品，名富說原理（Principes de la Théorie des Richesses）。可是實際上此書的才氣很大，有許多反對普通經濟學者的有力的理論，但放棄了數學方法，並且全書中找不出一個幾何公式。著作者承認一般公衆對於用數學符號討論經濟恆表示一種憎惡，雖是他想符號方法，於進行說明，確定觀念，和提示更進的發揮上，大有效用，但他也承認有許多隨着發生的重大危險。他的意思，以爲危險在於研究的人或許對於他所出發和構成公式的抽象的假說過分的重視。他的實際結論是運用數學方法須十分審慎，若是公衆的評判都反對這個，就寧

可不用，他說『這種評判有暗中的理由，差不多常常比個人所持的理由還更可靠。』這是很明白的說法，採用不健全或片面抽象原則作爲論辯的前提，不緣於數學方法之用否；雖是數學方法之運用可以連帶發生一種幻想，即覺得這些前提是確切的。但是在經濟推理中運用數學法的最大障礙，就是這法是枯索的。若是我們考查一下以前運用數學法的成績，就知道演繹所依據的根本概念，性質上是很空洞而且是形上的。動物的或道德的滿足單位 (units of satisfaction)、效用的單位，以及等等，與實質科學是膈膜的，正如睡官 (Dormitive faculty) 單位與牠膈膜一樣；而價值單位，除非我們知道價值是一種商貨在一定情形下交換他種商貨的分量，也不過指示同樣無定的觀念。我們若是已經見出交換的比率了，數學自然可以寫成等式；可是這些比率不是數學推算的本身可以決定的，因爲數目的結論須包含數目的前提，這是數學所沒有的。那麼將來就不需要這種學問，而研究此學不過徒費腦子罷了。可是這種結論，不能影響數學爲達到較高研究的工具之重要。物質的媒介或環境，乃經濟現象之所發生，及其變化的淵源，我們要研究這些，不能不用數學爲工具；并且數學能給人以合理研究的原始準則，與人以堅決證據的活動情緒，和掃除人們腦

筋中幻想的概念及詭辯的聯想，這種引人入勝的功效，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可棄掉的。所以經濟學者要敘述學說正確，不發出廣漠無定的泛論，至少數學基本原則的知識是必須具備的。就是著名的學者有時在此點也不免有重大的缺陷；所以他們於二數之和（非二數之合）爲常數（constant）時，遂認爲一數是與他數『反變』的；而於性質不同不能有共同標準的東西之積聚，又認爲可用數目計算。第二種錯誤的實例，可舉李嘉圖常說的『勞力數量』（quantity of labour），並且此說在他的制度的基礎，而所謂勞力，乃包括各種不同的努力，差不多不能統計或比較的。

意大利

原富最初的意大利譯本出現於一七八〇年。然而此處要討論的這時代最著名的意大利學者，卻不是斯密的信徒。此人即宙雅（Melchiorre Gioja），除了統計的和他種著述外，撰著有一部龐大的書，名經濟學新論（Nuovo Prospett delle Scienze Economiche，共六冊，一八一五—一七年出版；此書并未完成。）他的意思要把公經濟和私經濟範圍中，一切學者之所教授，政府之所